从独立成子目成部类到独立成专目

——中国方志目录源流新考

赵太和

提　要：最早的方志目录脱胎于综合性书目，萌芽于梁代《七录》，唐初《隋书·经籍志》于史部地理类著录方志的做法成为后世主流分类法。因早期方志内容不固定体例不完善，致使方志目录长期未形成子目或专类、专部。宋代方志趋于定型，《通志·艺文略》出现方志类子目，方志目录略具雏形。明代方志迅速发展，不少目录中出现独立出史部地理类的方志部类，专志类目也大为丰富。清乾嘉至民国是方志目录学的形成期，章学诚创立古典方志学，其《史籍考》中首次出现“方志”类名称，周广业撰成第一部方志专目《两浙地志录》。至民国时期方志目录学基本形成，若干体裁的方志专目略备。

关键词：方志学　方志目录　分类　目录源流

方志是我国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我国现存旧方志 1 万种左右，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① 众所周知，目录学不仅可以摸清古籍家底，而且还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此，整理、研究和利用方志，有赖于研究方志目录学，而对方志目录源流的探讨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工作。目前，前人探讨方志目录源流的成果虽然不少②，为深入研究做了较好的铺垫，但尚有值得探讨之处。因此，有必要对方志目录源流“接着讲”。

一　方志的起源与界定

循名责实，探讨方志目录源流首先需要厘清方志的起源与界定。颇多前辈学者追溯方志起源时，把《禹贡》《山海经》《周官》《越绝书》《华阳国志》及鲁《春秋》、晋《乘》、楚《梼杌》等经书、古代诸侯国史、区域史当作方志的源头③，导致把方志和经书、地理书、地方史混为一谈，致使探讨方志源流时，把目录中地理书、地方史的类目直接当成了方志的类目。

其实方志和地方史有别，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谭其骧就指出二者不同，他说：“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在《隋书·经籍志》中列于杂史，晋代的《华阳国志》，在《隋书·经籍志》中列于霸史、伪史。现在有些人把这些看成是最早的地方志，我是不大赞成的。这几部书的内容与隋唐以后的地方志不同，是地方史。”④ 王燕玉指出方志和地方史、地理书各不相同，

---

① 参见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60 页。

② 如辜学武：《我国史志目录的体例及其源流浅析》，《湘图通讯》1980 年第 6 期；张纪亮：《地方志在历代书目中的归属》，《图书馆学研究》1985 年 6 月；王建国：《浅谈方志目录的产生及发展》，《山东图书馆季刊》1987 年第 2 期；林申清：《方志目录学浅说》，《黑龙江图书馆》1991 年第 4 期；巴兆祥：《民国方志目录学之成就与影响》，《江苏图书馆学报》1997 年第 1 期；巴兆祥：《论方志目录学》，《新世纪图书馆》2003 年第 3 期；巴兆祥：《方志目录学刍议》，《中国地方志》2003 年第 3 期。

③ 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5—56 页。

④ 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周口地区地方志编纂领导组编：《地方志学习参考资料》第 2 辑，1982 年，第 10 页。

“着重详述一区域的山川、物产、建置者，叫做地理志；侧重专叙一区域的军、政、财、文大事者，叫做地方史；而囊括载记一区域的自然、社会全貌者，则叫地方志，简称方志。三者关系，出入相差，地理志、地方史不能代替地方志，地方志原则上却可包含地理志、地方史，不过所同部分有详略、深浅之分。换句话说，地方志广而全，地理志、地方史狭而专，不容混淆。”① 自《隋志》正式确立四部法，把方志和地理书、地方史混杂著录于史部地理类后，影响深远，后世史志目录无不宗之，《四库全书总目》及《书目答问》亦是如此。因此，至今仍有学者径把方志与地理书、地方史混为一谈。

关于方志起源，谭其骧②、史念海③、黎子耀④等人皆已指出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仓修良亦主地记说，进而指出方志的发展经过了汉魏南北朝地记、隋唐图经、宋及其以后定型方志三个阶段⑤。但见闻笔记体地方文献并非方志，如《秦边纪略》⑥、《龙沙纪略》、《柳边纪略》之类，皆是舆地著作。因此，本文探讨方志目录源流时，以书目中方志的早期形态地记、图经和定型方志类目变迁为考察对象，舆地著作等地理书和地方史类目演化不再作为研究重点。

二　萌芽期（南朝梁至宋）：方志目录从混沌到独立成子目

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目录著作始于西汉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惜皆已不传，但从《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尚可窥见二书之一斑。《汉志》虽未著录方志，但有学者指出《汉书·地理志》资料来源可能包括当时的方志。⑦ 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学继续发展，产生了四分法、七分法。曹魏秘书郎郑默撰《中经》，久佚。西晋荀勖因《中经》更著《新簿》，分群书为四部，按甲、乙、丙、丁编次，其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⑧。东晋李充《晋元帝书目》更换《中经新簿》乙丙位置，于是史书学术地位得以提高。从《别录》《七略》《汉志》《中经》《中经新簿》到《晋元帝书目》和《七志》，尚无史名，土地或地理志也没有形成专类，更未著录方志。

其实，书目著录方志始于梁阮孝绪《七录》，其内篇《记传篇》设土地类，著录地理书及地记等书。今尹炳艳《七录》重辑本辑录土地部 62 种书，其中包括顾启期《娄地记》、山谦《吴兴记》、顾夷《吴郡记》等地记。⑨《隋志》“貌似荀、李而质实刘、阮，远承《七略》之三十八种，近继《七录》之四十六部”⑩，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分法，成为后世官私目录史部地理类著录方志的准绳。但需要注意的是，《隋志》并未单独为方志设立子目，仍是与地理

---

① 王燕玉：《方志综论稿》，《紫巢文存》第 3 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86 页。

② 参见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周口地区地方志编纂领导组编：《地方志学习参考资料》第 2 辑，1982 年，第 10 页。

③ 参见史念海、曹尔琴：《论方志的断限问题》，《方志学刍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13 页。

④ 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初版前言”，第 4 页。

⑤ 参见仓修良：《我与中国史学史》，《仓修良探方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6 页。

⑥ 参见李文君：《〈秦边纪略〉所记的明代西海蒙古首领卜儿孩事迹》，《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杜常顺：《关于〈秦边纪略〉对清初青海蒙古的若干记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3 期。

⑦ 参见史念海、曹尔琴：《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方志学刍议》，第 3 页。

⑧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 15 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 页。

⑨ 参见尹炳艳：《〈七录〉研究及其重辑》，吉林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 59—61 页。

⑩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66 页。

书、地方史混杂在一起。因地记兼记人记地，因而出现《隋志》中一种地记既著录于杂传类又著录于地理类的情况，如圈称的《陈留耆旧传》（二卷），《隋志》著录于杂传类，而地理类又著录《陈留风俗传》（三卷）。姚振宗指出："按此《风俗传》与《耆旧传》本为一书，前世著录家乃分出《耆旧传》二卷入杂传，而此连《风俗传》并入于地理，务欲各充其类故也。《唐·经籍志》总入此类，《新志》则两头互见。"① 一书两见，与早期方志内容范围不固定和体例不完善是分不开的。

即使方志于宋代趋于定型以后，四部法仍是书目主流分类法。清乾隆时编刊《四库全书总目》，用四部法，其史部地理类下设子目有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乾隆朝以后目录学的权威著作，此后清代私家目录深受其影响。如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谨依四库部分，编《书目》二十卷，继又择宋元旧刊及有关实学而世鲜传本者另为一编，略附解题，以志流别，名之曰《爱日精庐藏书志》"②。该目史部地理类下分宫殿簿、总志、都邑郡县、河渠、边防、古迹、杂记、游记和外记。《爱日精庐藏书志》不仅继承《四库全书总目》的叙录解题体制，开创了藏书志的目录新体制③，而且其地理类分类法与《四库全书总目》如出一辙。咸丰、同治年间的沈德寿仿《爱日精庐藏书志》撰《抱经楼藏书志》，其史部地理类子目与张金吾书目相同。清代这种在四部分类法史部地理类下著录方志的主流做法一直持续到清末，《书目答问》史部地理类下置古地志、今地志、水道、边防、外纪、杂地志 6 个子目，仍是沿袭了自《隋志》确立、《四库全书总目》沿袭之成规。

但通过书目中方志类目自身的变迁可以考见方志目录的演变。独立为方志设立子目发端于唐代刘知幾《史通·杂述》，刘氏划分史部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为史学之正源，又细分十流：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其中郡书和都邑簿是后世方志的前身。刘知幾认识到为方志单独设子目的可行性，但《史通》是史学理论著作，并非目录学专著。真正把方志设子目付诸实践的是宋代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此书史部地理类设置地理、都邑、图经等子目，相对于《七录》《隋志》混杂地理书与方志的混杂状态来说，无疑是巨大进步，其单独为方志设置都邑、图经子目，也是创举。尽管自《通志》开始，方志有了独立子目，但距离方志从史部地理类独立成类，与地理书并驾齐驱，相去甚远，仍有待于后世。

三　雏形期（元明至清初）：方志独立部类的设置

元代起自漠北，未遑文事，官修目录有所衰落。从《秘书监志》中尚可窥见元代最主要藏书机构秘书监藏书分类的大概情况，其中志书部著录地理书和方志，志书部从史部独立，与史部并处同级地位。《秘书监志》记载的书目是排架目录，其志书独立设部跟元代创修《元一统志》和方志大量入藏有关，大量志书适合集中庋藏。元秘书监掌历代图籍，修《至元大一统志》时在秘书监内设著作局负责编纂事宜。《四库全书总目》载："考舆志之书，出自官撰者，自唐

① 姚振宗撰，刘克东、董建国、尹承整理：《隋书经籍志考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 15 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921 页。

② 张金吾撰：《言旧录》"嘉庆二十三年戊寅三十二岁"条，《嘉业堂丛书》本，民国 2 年（1913）吴兴刘氏刻本，第 22 页。

③ 参见严佐之编著：《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04 页。

《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外，惟元岳璘等所修《大元一统志》最称繁博。”① “要编出内容如此‘繁博’之巨著，若没有丰富的图书典籍为依托，是不可能的”②，当然，若没有大量方志为参考，也是不可能的。虽然《秘书监志》所附书目“实际上只是秘书监的一份图书清册，不能起到图书目录的作用”③，但是方志已有独立设部的倾向。

明代方志得到迅速发展，“无论从种类上还是数量上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④。“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粗略统计，今存明代方志尚有992种，其中不包括山、水、寺庙、名胜等志。若将这些统计在内，将大大超过千种以上。”⑤ 明代目录学也形成兴盛期，不但书目数量大增，仅《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代私家藏书目录就有42种，而且产生了颇多突破四部成规的目录书，从中能体现明代方志学的新动向。包含方志的地理书独立出史部的情况在明代目录书中得以实现，甚至部分目录书中出现了方志独立的部类，与地理书并驾齐驱，体现出明人具有不再把方志看作地理书的观念。“只要打开当时所修方志的序和跋来看，几乎无不是一言以蔽之地说郡县之志就是郡县之史。”⑥ 明人甚至把宋代以来方志为一方之史的性质提到国史的程度，并且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⑦ 随着专志的日益发展，明代目录中方志类目更加详细，出现不少专志类目。

明代官方目录方面，突破四部成规，地理书独立出史部，不设地理类目，改设体现方志特点的一级类目，如图志、诸志、志乘、志书类目等，甚至出现方志一级类目郡县志部。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采用非四部的编排方式，因“地方志特多”⑧，故将地理书更细分为古今志、旧志、新志3个部，与史书并处一级部。其中古今志部混杂地理书与方志，而旧志部、新志部则皆为方志。万历三十三年（1605）张萱和孙能传等仿《文渊阁书目》编成《内阁藏书目录》，亦废地理部，改设图经部及志乘部。《文渊阁书目》不守四部之成规的做法，对私家目录书影响颇大，实开有明一代之风气，此例一开，“有明一代，除高儒、朱睦㮮、胡应麟、焦竑、徐㷭、祁承㸁六家仍沿四部之称而大增其类目外，私家藏书，多援《文渊目》为护符，任意新创部类，不复恪守四部成规。此在分类史中实为一大解放，而摧锋陷阵之功要不能不归《文渊目》也”⑨。比如明武宗正德间陆深的《江东藏书目》设诸志部、世宗嘉靖间晁瑮的《宝文堂书目》设图志部、嘉靖三十年（1551）孙楼的《博雅堂藏书目录》设志书部、嘉靖至隆庆年间沈节甫的《玩易楼藏书目录》设志部、宪宗成化七年（1471）叶盛的《菉竹堂书目》设古今通志部及郡县志部，郡县志部独立成一级部自此始。

明代目录书主流分类法仍是四部法，焦竑《国史经籍志》绍承《通志》于史部地理类下设郡县、图经等方志子目。但明代四部书目中也不乏在史部二级类目废地理类改设为突出方志特点类名，诸如地志、图志等，这与《通志》只在史部地理类下设三级子目都邑、图经的做法相比，明显提升了方志的学术地位。如隆庆四年（1570）《万卷堂书目》于史部第十二类不设地理类，改设地志类，其实除《明一统志》为地理总志外，余皆方志。万历三十年（1602），徐㷭编《徐

---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中华书局，2008年，第576—577页。
② 陈矩弘：《元代秘书监藏书论略》，《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3期。
③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2005年，第151页。
④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第270页。
⑤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第269页。
⑥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第277页。
⑦ 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第277页。
⑧ 姚名达撰：《中国目录学史》，第94页。
⑨ 姚名达撰：《中国目录学史》，第94页。

氏家藏书目》，在史部下亦废地理类目，改置方舆，下设总志、分省、边海、外夷、各省杂志、各省题咏等子目，其中方志多置于分省类目内。徐㷭是福建人，其分省类方志，先列福建乡邦方志，北南直隶省及其他各省方志列福建方志之后。万历年间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总体编排方法仍是因循四部分类，其史部不设地理类，但具体则采用千字文总领各细部，其宙字号史部下设总志、河、南直类；洪字号史部下有北直、南京各衙门、北京各衙门、外国诸夷志。可见《脉望馆书目》也采用分省著录各省方志的方法，但与徐㷭目录相比，《脉望馆书目》只有两直隶省方志，其他省方志付之阙如，体现出赵琦美方志收藏的地域性特征。《脉望馆书目》特设北九边及南九边子目，著录包括明代才有的边关卫所志等，这与万历年间边事日蹙有关。钱谦益说："神宗之末年，建州夷躏我辽左，赵君（按：赵琦美）官太仆寺丞，有解马之役。匹马出山海关，周览阨塞要害，遇废将老卒，从容访问我所以败夷所以胜者，感慨挥涕，慨然奋臂出其间。归而上书于朝，条上方略。"① 赵琦美重视边事，使其目录著录范围更广及边塞地区，边关卫所专志子目极具时代特点，适应了万历年间社会文化的需要。

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同样不设地理类目，而在史部第十四类设图志类，其三级子目比《徐氏家藏书目》《脉望馆书目》划分地更细，分别是统志、通志、郡志、州志、邑志、关镇、山川、揽胜、园林、祠宇、梵院等 11 类，其中统志属于地理总志，不属于方志。至此，方志类目大有包揽地理书的势头，如此详细的二级类目在明代四部法中是不多见的。"由于明代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许多乡镇发展很快。为了适应这种地方经济的发展，许多乡镇也编修了志书，这是明代方志编修中一个新的动向，并且进而向专志的方向发展，诸如山水、寺院、寺庙、古迹等也都编修了志书。于是方志的编修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内容的不断增多，又逐步由合而分地向专志编纂发展。"②《澹生堂藏书目》顺应社会经济和方志学的发展，及时调整目录类目设置，设置郡志、州志、邑志、关镇、山川等专志新类目，极大扩展了方志目录著录的内容和范围，推动了方志目录学发展。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陈第《世善堂书目》在史部第十二类设方州各志类，该类目名称已经接近章学诚《史籍考》"方志"类目。

明末清初仍然是四部法和非四部法并行，私家藏书目录颇多采用非四部法，该时期方志类目出现类目划分更细的情况，这在私家藏书目录中有明显体现。如钱曾《也是园藏书目》，采用非四部的二级分类法：经史子集外，增设明史、三藏、道藏和戏曲小说四部。史部下设二级类目郡县杂志、图志和山志等类目，山志是钱曾创立的新类目。他的《述古堂藏书目》也采用非四部法，亦设山志类目，这比明代《澹生堂藏书目》山川合志类目划分的更细，体现出清初方志之专志发展更深入的倾向。当然，有学者对分类过细的现象不以为然，郑鹤声曾以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为例进行批评，他说该目史部所设"地志、别志、朝聘行役、蛮夷，皆地理之属，分而为四"③。严佐之则认为："其实，《传是楼书目》对史部书的类分还不及《也是园藏书目》多而细，这实质上反映出当时读书人对史书观察分析的程度，他们设置的类属名目，很多已为后世袭用，只不过后人的进步是按其性质拉开级次层次，更趋合理。所以《传是楼书目》分类显得繁琐，并不在其多，而在其层次不明。"④

---

①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536 页。

②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第 269 页。

③ 郑鹤声编：《中国史部目录学》，"民国丛书"第 2 辑，上海书店，1989 年，第 125 页。

④ 严佐之编著：《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第 35 页。

至清乾隆时四部书目也呈现出类目划分更细的情况，如汪诚的《振绮堂书目》采四部法，其史部下设地志类，子目有通志、郡志、州郡志、名山、水利、舆图、杂志（都邑、陵墓、祠庙、寺观、方物）、游记、外域，该目亦有山志子目。明至清初综合性目录的专志类目多被后世继承，如《中国丛书综录》史部地理类，除了方志之属，还有专志之属，包括宫殿、园亭、佛寺、道观、祠墓、书院；亦有山水之属，包括合志、山、水 3 个子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与《中国丛书综录》如出一辙，下设专志，包括古迹、宫殿、寺观、祠庙、陵墓、园林、书院等；亦有山水志，包括山志、水志。

有学者认为："明人目录大多数没有解题，有些只做简单注释。因为明人目录多是基于私人藏书编纂的，故而多重书籍之时代与版本，对于其中的义理与学术则不是很在意。这些目录对于考证书籍的存佚与版本来说，或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要据之了解一代学术之源流与格局，则帮助不是很大。"① 笔者不敢苟同，早在宋代郑樵针对解题提出"泛释无义"的著名论断。虽然郑樵不反对解题，但是他说："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今当观其可不可。"② 其实，时至今日，解题与简目并行不悖，简目自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包括学术源流的价值，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如《书目答问》虽为简目，但是张之洞、缪荃孙的出发点暗含"学者当知学有流别"的意思，"今为分别条流，慎则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③。

四　方志目录形成期（乾嘉至民国）：方志专目的形成

我国古典方志编修至清代进入全盛时期，关于方志的编纂和研究发展成一门新的学问——古典方志学，以章学诚的贡献为最大。④ 章氏《史籍考》分史书为 12 类：制度部、纪传部、编年部、史学部、稗史部、星历部、谱牒部、地理部、故事部、目录部、传记部、小说部，其中地理部有总载 5 卷、分载 17 卷、方志 16 卷、水道 3 卷、外裔 4 卷。至于创立古典方志学的章学诚为何仍把方志置于地理部，姚名达认为是因为章氏胆怯。他说："然不久即因四库馆开，清帝谓'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为古今不易之法'。学诚胆为之怯，不敢坚持其说。故于《校讎通义》中又谓：'《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较其矛盾，不及孙星衍之有胆有识远矣。"⑤ 刘咸炘则认为是章氏自忖一己之见难以取信于人。他说："至于方志，则胎于《华阳国志》，成于宋世，与国史为一纵一横之殊。赅存文献，非复地理专门，与古地理之稍兼文献者殊。章氏不与分载同编，而别为子目，正此意也。其不出之地理者，以宋、明诸志非能用史裁，而己之高论，又恐人不信也。"⑥ 要之，方志发展到章学诚时代，第一次以较完备而集中的门类出现在目录书中，不再与地理书混编，为以后方志专门目录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

① 王锦民：《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66 页。
② 郑樵撰：《通志》卷 71《校讎略・书有应释论一篇》，中华书局，1987 年，第 835 页。
③ 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略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3 页。
④ 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第 386—442 页。
⑤ 姚名达撰：《中国目录学史》，第 100—101 页。
⑥ 刘咸炘：《刘咸炘论目录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173 页。

以往学界一般以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首创方志提要专目。① 但是在瞿宣颖之前，方志提要专目尚有周广业的《两浙地志录》（下称《地志录》）。《地志录》成书后，未及刊行，流传不广，长期处于若存若亡之间。因此，关于此书存佚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苇说此书“惜今不传”②，仓修良说“仅见于前人著录”③，巴兆祥说“惜书早佚，详情不得而知”④，胡惠秋及刘光禄⑤、薛虹⑥、衡中青⑦、陆振岳⑧、王锷⑨等亦主亡佚说。

其实民国年间，《地志录》仍然在流布，夏定棫曾作《〈两浙地志录〉稿本跋》⑩，1936 年，朱士嘉撰《临安三志考》就引用过《地志录》。其后，姚名达说：“道光中，周广业撰《两浙地志录》，今存。”⑪ 20 世纪 30 年代去今未远，《地志录》虽有遽然失传的可能性，但通过检索发现，此书并未失传。1930 年《地志录》被周广业的同乡后学费寅据稿本整理刊布在《浙江图书馆报》1930 年第 3 卷第 4 期。该馆报本是费寅的校证本，卷端署：“海宁周广业遗稿，邑后学费寅校证。”⑫ 费氏校证以按语的形式列于周氏提要之后。又国家图书馆有郑振铎藏抄本（下称国图抄本），无费寅校证。《地志录》一册，不分卷，无序跋，共著录 74 种浙江省方志。国图抄本末附他省方志 16 种、《水经注》一种，费寅校证本无之。《地志录》系周广业的读书札记式提要，著录浙江省方志，首标书名、并著录卷数和册数、纂修年代及过程、作者字号里籍和科名官爵，品评内容，辨章学术、考镜志书源流。显然，《两浙地志录》是现存最早的方志提要专目，弥足珍贵。

民国时期，是方志目录学的重要形成期，出现了多种体裁的方志目录书，如馆藏方志专目、馆藏方志联合目录、方志提要（含辑录体方志目录）、方志简目等。1912 年，缪荃孙把清末内阁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编录为《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奠定了馆藏方志目录学的基础，对后世影响颇大。继起者有 1931 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故宫方志目》（1948 年又有《续编》）、1933 年谭其骧编《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1936 年冯贞群编《天一阁志目》等，私家藏方志目有 1936 年任凤苞《天春园方志目》等。1935 年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首创馆藏联合目录，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打下了基础。方志专目以方志提要为最早，始自周广业《两浙地志录》，1930 年有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1934 年有张维《陇右地志录》及《补录》等。提要目录中重要的辑录体方志目录首创于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张氏仿朱彝尊《经义考》，“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人，编者间抒己

---

① 参见梁锦秀：《〈方志考稿〉（甲集）订误四则》，《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 年 10 月，第 80 页；巴兆祥著：《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 年，第 298 页。

② 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黄山书社，1986 年，第 285 页。

③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第 469 页。

④ 巴兆祥：《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 年，第 291 页。

⑤ 参见胡惠秋、刘光禄编著：《方志学引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年，第 286 页。

⑥ 参见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91 页。

⑦ 参见衡中青：《古籍计算机全文数据库及内容挖掘研究——以方志物产广东为例》，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6 页。

⑧ 参见陆振岳：《方志学研究》，齐鲁书社，2013 年，第 206 页。

⑨ 参见王锷：《张维与〈陇右方志录〉》，《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4 期。

⑩ 参见夏定棫：《〈两浙地志录〉稿本跋》，《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 2 期，1945 年 5 月。

⑪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 291—292 页。

⑫ 北京图书馆编：《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续编》第 16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第 252 页。

见，则附著案语之中”①，并且注明存佚情况。方志简目有1934年徐长楣编《民国二十二年以来所修方志简目》，著录1933年以来所修刻方志370种，每志著录书名、卷数、编纂者及编纂时间。至此，方志目录学几个主要的分支目录学皆已形成，蔚为大观。

余　论

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地记是方志的最早形态，目录著录方志最早体现在综合性目录。方志目录萌芽于南朝梁代，始于阮孝绪《七录·土地类》。隋唐时期图经大盛，唐初《隋志》正式确立四部法，其史部地理类绍承《七录》绪余著录地记、图经等方志，成为封建社会主流的图书分类法。因早期方志如地记兼记人记地，早期方志目录存在一书两见的混乱情况，在宋代定型方志前，综合性书目中方志长期未能形成专类专部。

目录之书，实兼学术史，通过书目中方志部类变迁结合方志学的发展，可以考见方志目录自身的源流。唐代刘知幾所撰《史通》认识到为方志单独设子目的重要性，宋代郑樵的《通志》真正把方志设子目付诸实践，相对于《隋志》混杂地理书与方志的混沌状态来说，无疑是方志目录史上的巨大进步，其单独为方志设置都邑、图经子目，也是创举，但距离方志独立出史部，亦即方志学成为专门之学尚远。元代逐渐形成把地理部独立出史部的分类观念，明朝初年付诸实践。以《文渊阁书目》为代表的非四部法把地理书独立出史部。明代甚至出现了方志独立的部类，方志与地理部书取得同样的地位，体现了明代一些学者对方志的重视，即明代颇多学者不再把方志当作地理书，使得方志的学术地位大为提高。而且随着明代方志向专志的深入发展，方志类目更加丰富，出现了山水志、山志、边关卫所志等新类目，为后世继承，推动了方志目录学的发展。

不可否认，明至清初官私目录无论是否采用四部法，其若干独立的方志门类尚未统辖于专门的方志类目，体现出方志学的发展尚未发展成专门学问。清乾嘉时期章学诚创立古典方志学，方志作为较完备而专门的门类第一次出现在目录书《史籍考》。周广业更撰现存第一部方志提要《两浙地志录》，是为方志专目之嚆矢。民国时期，我国方志目录学终于形成，其框架基本搭建起来，诸如馆藏方志目录、馆藏方志联合目录、提要目录包括辑录体方志目录、方志简目等方志目录体裁皆已出现，蔚为大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志目录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至今，各种方志专目已蔚为大国。② 但综合性书目中方志部类位置的讨论仍在持续，已有学者呼吁应把方志从史部三级类目提到二级类目③，甚至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分类法已难适用实际需要，宜单独设立‘方志部’以解决矛盾”④。回顾方志目录源流可知，综合性书目中方志部类的设置及发展与方志学息息相关，方志目录学及方志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各自学科体系及学科理论建设尚不完善，甚至与已有成就相比略显滞后。因此，相关争议仍需深入讨论，而方志目录学及方志学学科体系和理论建设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舟山市历史学会）

本文责编：周　全

---

① 张国淦编著：《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页。

② 参见郝润华、王福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志目录的编撰》，《中国地方志》20014年第2期。

③ 参见王闻多、王若：《〈方志〉应从史部三级类提到二级类》，《图书馆学研究》1990年第6期；王若：《关于方志调到史部二级类的探讨》，《图书馆学研究》2002年第12期。

④ 陈东辉：《古籍分类中增设‘方志部’的探讨》，《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